

目 录

楊增新統治时期的新疆

——新疆回忆录之一 包尔汉(1)

金树仁統治时期的新疆

——新疆回忆录之二 包尔汉(124)

盛世才入新夺取政权的经过 宫碧澄(197)

盛世才是怎样取得新疆統治权的 周东郊(210)

盛世才在新疆的特务統治 周东郊(233)

1944年盛世才在新疆的最后一次大逮捕 李帆群(274)

吳忠信主政新疆紀略 曾小魯(289)

楊增新統治时期的新疆

——新疆回忆录之一

包 尔 汉

一 我的故乡、祖国

如果說新疆也有魚米之乡，阿克苏是可以当之无愧的。阿克苏是以阿克苏河得名的，譯成汉语是“白（阿克）水（苏）”。它汇合从天山南麓流来的昆阿立克和托斯干两条河，浩浩蕩蕩地往南流去，滋潤着塔克拉馬干大沙漠西北緣的土地。多少世紀，劳动人民在这里斬棘披荆，把它建成为盛产稻米、棉花、水果之乡，河里的魚也是捕之不尽的。

这儿便是我的故乡。

故乡是美丽富饒的。但是在人剝削人的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手創的魚米之乡却成了王公大人們的乐园。十八世紀末，活不下去的农民曾自发地起来反抗；但是在封建主的武装鎮压下，我的上五代祖帕拉提随着以玉素甫为首的二十多戶貧农离开了依列克村，逃亡到中亚。他們在继续西进的道路上被沙俄的官吏們截留下，强迫他們定居到哈桑省內的森林里，要他們在那里伐木垦荒。这二十多戶流亡的貧农同原有的少数移民，被迫付出艰辛的劳动，在那里建立了农村。他們念念不忘故乡，就把这个新地方也叫作

阿克苏，尽管那里没有浩荡的大河。这个小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便诞生在那里，并度过了我的童年。

我的祖父郭拜都拉——腰已累弯了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常常给我讲故乡的风物。他说过下面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们的故乡阿克苏才是真正的阿克苏呢！那是在遥远的中国。中国才是我们的祖国呢！”

祖父爱恋祖国，总想在有生之年把一家人拖回去，尽管他也诞生在中亚。他说过：“真主把土地赐给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一双手来养活自己。但是只有祖国的土地才是最温暖的。阿克苏河水比别处的蜜汁还会甜吧！”

到了1907年，也就是我的祖父故去的第二年，我跑到哈桑去投奔我的舅父，实现求学的理想。

原来我的父亲沙赫都拉在家里种地，生活是很苦的，他不主张我到外面去读书。在母亲的帮助下，有一天夜里我悄悄地离开了家，搭上一辆马车，两天后到达了哈桑。

我的舅父吉那都拉在哈桑作小买卖，收入微薄，但他终于帮助我进了寄宿小学，每天给我十个戈比，作为我的伙食、购买书籍纸笔之需。这一年我正十一岁。穷孩子读书是不易的，二年后我略具写算知识，便希望能找到一个还能继续自修的职业，从而减轻舅父对我的负担，并能给贫苦的双亲一些补贴。1909年，我舅父把我介绍到哈桑的一家书店里作学徒。书店里当然不缺乏书，但是学徒的工作，一年到头总是从天亮到半夜。那时候，我的心情正像喉嚨干渴，面对着几皮口袋马奶子，而又无从尽情饱饮一样。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一个来书店买书的商人谈到，他们的商店需要能写会算的学徒。他们的商店在中国还有分店，比如新疆的

烏魯木齊、塔爾巴哈台等地，那里業務興隆，也需要人。我一聽到新疆（那时候中亞商人是把新疆稱作東土耳其斯坦的），便想起了祖父的話，油然而生了嚮往之心。幸好書店有沒有我這樣的學徒並不影響它的業務，于是我便隨着這個商人到他的斜米總店作學徒去了。

這個商人名叫司馬益，是天興行資本家依斯哈克的弟弟。天興行是專門經營對新疆進出口貿易的，資金雄厚，是弟兄合伙的買賣。我在斜米工作了不到一年，終於實現了我的想望，被調到這家商店的烏魯木齊分店去。

1912年9月，我以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只身回到百多年來我的祖、父所依戀的祖國，後來还把一家人都拖了回來。

二 帝俄籍商在新疆

天興行烏魯木齊分店開設在烏魯木齊南關的貿易圈里。當時人們把這條街叫作洋行街，因為街上的商店大都是帝俄籍商人開設的，商店的招牌上都寫有“俄商”字樣。

貿易圈這個名詞，就是在幾十年前，內地人聽來也是生疏的。它最早叫買賣圈子，實質上就是帝俄在烏魯木齊霸占的一塊土地，同當年天津、上海的租界地幾乎没有什么兩樣。

帝俄政府以不平等條約——1879年《伊犁條約》，取得了在烏魯木齊設立領事官的權利，同時在該不平等條約內還援引另一不平等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的條款，取得了中國官廳“應給予所蓋房屋、牧放牲畜、設立墳塋等地”的權利。這些所謂“給予”地，在市內的便叫貿易圈，圈里的一切事務都由帝俄的領事官管理，中國官廳無權過問，雖然在上述的不平等條約內並無明文規定。烏魯木齊的貿易圈是1895年劃的，有無文約，我不了解。我在

天兴行的日子，这个貿易圈的范围是北起皇城巷，南至三通碑，东达义塚，西尽西河坝。《新疆图志》关于烏魯木齐的貿易圈有这样的記載，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划貿易圈于迪化，是三道桥南官大路东西两段地方。

当年开设在烏魯木齐貿易圈里的較大的洋行一共有八家，其中最大的是韃靼人胡賽音、哈桑兄弟等的吉祥湧；其次是韃靼人伊斯哈克兄弟等的天兴行，烏孜別克人伊敏江、土尔逊巴巴的德盛行，烏孜別克人美尔沙里、拉合滿巴依的德和行；再次是烏孜別克人滿素尔江的吉利行，烏孜別克人塔居斯曼的仁中信行，韃靼人孜牙巴依的芝盛行，烏孜別克人阿布特的茂盛行。这些商行在斜米、塔城都設有总店和分店，有的还在吐魯番、奇台等地設有分店^①。商行的資本家都是随着殖民地掠夺而兴起的暴发戶。比如吉祥湧的創始人拉馬占阿吉，原来是个車夫，他的承继人——他的侄儿胡賽音是个貧农。

新疆原来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十八世紀以来，外資逐漸侵入，到了十九世紀中叶，它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主要是帝俄和英国）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猎取地了。单以我所在的天兴行說，每年它的烏魯木齐分店从俄国运入的各种布匹就有二千捆，每捆二十匹，每匹三十米，合計达一百二十万米，它从新疆运出的土产，仅棉花一項就有九万余公斤^②。

① 1907年前后，烏魯木齐帝俄籍商三十余家，商人（包括行商）八百余人，年終存貨多达三十万卢布。

② 本世紀初，从烏魯木齐经由帝俄籍商人每年运入俄国的羊毛值五十余万卢布，羊腸值五千六百余卢布。我到烏魯木齐的那一年(1913年)，新疆对帝俄的貿易总额，輸出为九百八十万卢布，輸入为八百四十万卢布。土布（新疆把土布叫作搭连布）紡织业在洋布的大量輸入下，已濒于破产。

当年这些洋行经营的进口貨以布匹、铁、砖茶、紅茶、糖、棉线、石油、紙烟、火柴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出口貨以牲畜、羊毛、羊皮、羊腸、棉花、干貨、兽皮等为主。它們经营土产的方式是，在生产者需要資金的时候，以預付貨款的方式把进口貨和一小部分現金付給生产者，訂立如期交出土产的合同，如果到期不能交出，則須加几成甚至加几倍处罚。当年新疆的农、牧民因封建剝削残酷，加以生产技术落后（当然这也是封建制度的結果），只能維持简单的再生产，每年都需要举借生产以至生活資金，而地方上的高利貸使他們无法喘息，因而宁願接受洋行的訂貨預付款。至于大地主、大牧主，因生活上的大量消耗，以及需要洋貨供自己享受，也大都听凭洋行摆布。就我記憶所及，洋行同农、牧民或地主、牧主訂立购貨合同，一般是通过地方商人。因預付款而取得的利潤是非常大的。比如当时棉花的市場价格每百斤为新疆紙币四十两，而因預付貨款，每百斤只給十五两到二十两^①。这样，除中間人的佣金外，洋行也获得将近一倍的利潤，而且預付款大都折成洋貨，洋行从土洋貨的差价上获得的利潤就更大了。

但是这些洋行当年所以暴发，而且几乎掌握了北疆的商业经济，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经营进出口貿易不納稅。1851年在不平等条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內規定“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稅”。以后在1862年《陆路通商章程：续增稅則》、1881年《改訂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約內，規定中俄两国边界貿易在百里內均不納稅。而在1880年《改訂条約》这个不平等条約內竟写下“……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烏魯木齐

① 新疆紙币当时是以两为单位，1914年紙币一百两約合白銀六十两。

及关外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議定稅則，即將免稅之例废弃。”

清政府以后曾几次向帝俄政府交涉，取消不納稅的規定，但都无結果。我到烏魯木齐时，帝俄籍商人经营貿易依然不納稅，不但自己不納，还往往包庇中国商人不納稅，甚至在新疆境內作內貿也拒不納稅了^①。这样，他們所获的利潤就更大了。而且那时候帝俄正在奖励本国貨出口，对运貨去新疆的商人不但免稅，而且还給予奖励。有一个时期，已繳稅金的商品，如果改运新疆銷售，帝俄稅务机关根据商人的申請，查明屬实，就把已繳的稅金退还给申請人。又俄商凡运一馬馱俄貨入新疆，俄政府有关机关还给与业主十六个卢布的獎金。当年中国商人从天津、北京运貨来新疆，或由新疆运貨去內地，要通过重重稅卡，当然不能同俄商竞争，北疆的商业经济便由这些俄商操纵了。

俄商所持的借以免納稅款的通商執照，是由帝俄領事发給的，但須有中国外交官在上面签字。这种執照当年在新疆通称“通商票”。按照原来規定，通商執照的有效期为半年，并須在票面上注明商人姓名、貨色、包件数目。但后来俄領濫发，并把有效期改为一年，且不詳注持票人姓名、貨色、包件数目，而只写商人某某赴天山南北各城販貨，随帶本金俄帖若干、銀若干两（当年英帝国主义援例，英籍商人同俄商在新疆享有同样权利）。这样，稅卡既难于查驗，而且俄商依恃外勢，往往也不听稅卡检查^②。此外，中国商人

① 当时帝俄籍商人还从汉口販运土产经新疆出口，但是有时候他們在沿途出售（比如在酒泉、哈密等地），也拒不納稅。

② 这里且举一个事例：哈密商人阿赫毛拉（此人后来在盛世才时期曾任省銀行副行长），某次去四川办貨，借用吉祥湧的通商票，他回来路过肅州，稅卡要他上稅，他一时沒有找到通商票，就順口說他是西国人，竟混过去了。

往往出价借用俄商的通商票，或者通过俄領在新疆各大城镇指派的“商約”（也称“商总”，維語Ak-sakal，意为“紳耆”，表面上是各該地俄商推举的、办理有关俄商事件的人，实际却代行領事职能并担任坐探）向俄領領取通商票，用来冒充俄商，借以免納各項税金并欺压本国商民；帝俄領館为了拉攏地方商民外向，当然也乐于发給。而那些商約还发給俄商、甚至中商手书小条，只注明某某运貨若干去某地，作为临时性的、代替通商票的免稅证明。在楊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截至俄国革命、帝俄势力在新疆垮台前，有关这类事件的交涉，层出不穷。

当年，新疆土产每年经由烏魯木齐运往俄国的有十五万駝馱，每馱按十普同（每普同合十六公斤）計算，就有二万四千吨。运入烏魯木齐的洋貨，数量上也不少于此。每当春秋两季，貨物大量出入时，駝鈴响彻烏魯木齐——塔城——斜米的路。新疆的土产由此再往下新城（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运发，在当年欧亚商人云集的下新城临时交易市場上，新疆土产是惹人重視的商品之一，经营这项商品的商人，以及购之作原料的工厂主們，都直接間接地榨取了新疆劳动人民的汗血，从而发财致富^①。

我所在的天兴行的資本家就是其中的一个，这里且具体而微地介紹一下它的情况。

当年天兴行总店在斜米，经理是依斯哈克，他們弟兄四人，除他本人和一个弟弟司馬益在斜米外，塔城分店是由他的弟弟阿里

^① 按当年帝俄对新疆的进出口貿易，北路以斜米为总汇，南路以費尔干为总汇。我国土产经伊、塔两地运往俄国的不只是新疆土产，俄商还从內地販运土产，或经海道运往西伯利亚，或经嘉峪关运经新疆入俄。

夫和依布拉音主持，烏魯木齊分店的經理是外聘的帝俄籍鞑靼人哈桑，吐魯番分店是規模最小的，因為經常直接同當地人接觸，依斯哈克任用了一個吐魯番當地人穆海特作經理。

天興行在新疆的各分店，每年都按不同土產的生產季節，或直接派店員，或委託中國商人到各產區去訂立收購合同，有些生產者還直接到各分店的門市部來買賣貨物或講交易條件。許多中國商人和資金較少的帝俄籍商人，也與天興行有交易往來，但其中只有極少數商人同天興行有單純的貨幣資金往還，而且事例也是不多的。所有的洋行都不作買空賣空的買賣，而且也不注重點綴店鋪門面。

洋行收購的土產在外運前要經過加工，因而它們所獲的利潤里也包括着對加工工人的剝削。比如夏羊毛（五月份剪的）收購後要按毛色分類，投入水槽攪拌，洗去土砂、糞便等污物，再曬干、打包。烏魯木齊南樑，有個地方叫羊毛湖，就是當年洗羊毛的地方。秋羊毛（九月份剪的，毛短，主要用於制氈子）一般不洗，但也要按毛色分類。皮棉要經過清花，羊腸要由專設作坊刮去腸油、醃制，……各種土產都要按其性質加以不同的包裝。比較大的洋行都有自己的加工作坊。

加工工人，主要是臨時工。我所在的天興行在忙時要雇一百多個臨時工，臨時工的每日工資按勞動性質的不同，折合現在的人民幣二角到六角，工資之外，只供應茶水，工時每天十至十二小時左右。就當時的生活水平講，工人只能維持簡單的生活。這些臨時工主要是維吾爾人，以及少數哈薩克人和回族人。也有女工，大都作清花、按色別分類羊毛等工作。同內地的工廠一樣，洋行的上層分子對女工往往加以人身污辱。

因为新疆的土产出口，牲畜也占大宗，所以洋行还经营牧场，来牧放他们收购的牲畜并从而孳生幼畜。

洋行的牧场最初是根据前述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但在不平等条约内所指的，不过是供领馆及侨民临时寄牧自用牲畜的地方，但洋行则不但任意扩大这个地方，还用欺骗和行贿等手段霸占水草丰足的牧地。比如天兴行在昌吉县三屯河地方就有一大片草场，经常在那里牧放的羊群有二千多只，其他牲畜也为数不少。据我所知，天兴行的这片草场就是用行贿及外交压力从县知事手中取得的。

当年奇台县属南山白杨河以东的牧场，尽为天兴行等十余家洋行霸占。1915年省长杨增新曾令交涉员向帝俄驻迪化总领事交涉，俄商牲畜不得强占民地牧放。在他给交涉员的令文里说：“且该俄商等故意纵放牲畜，伤害禾苗，一经百姓查问，动启反噬行为。甚至割民之耳，殴人致死……该俄商等贩卖牛羊马匹不下十余万之多，霸占山场粮地，长此牧放孳生，实属无此办法。……”^①当然这类交涉是得不出具体结果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新、俄间的贸易趋于萎缩，一个时期若干洋行转向以经营牧业为主，成了大牧主。

洋行对职工的剥削也是残酷的。例如天兴行乌鲁木齐分店的固定职工通常在十五人左右。经理哈桑是资方代理人，每月薪资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二百五十元，食宿均由洋行供给。一般职工的薪给，除收皮等专家和会计略高外，店员和学徒月薪合现在的人民币二十到四十元。学徒虽由洋行供给伙食，工资也都被简单的生

^①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1页。

活用度耗去。这些职工，除了经理，每日工时都在十小时以上。一年間除了开斋、宰牲两个节日，是没有休息日的，而且在节日里，职工們要参加招待客人的工作，比工作日还要劳累。1917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我同德合行的夏卡夫联络不少洋行的职工，联名向資方提出了星期五休息一日的要求^①。資方同我們到帝俄駐迪化領館去打官司。領事迪牙闊夫鉴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对我們让步，結果，我們取得了星期五休息半日的权利；过了一年，又爭取到星期五全日休息。同我共同领导这次斗争的卡夏夫后来去苏联了，听说他現在在烏孜別克共和国科学院作院士呢。

洋行資本家那时候有事便找帝俄領事館，一般很少同中国官厅往来，只是每年春节按中国商店的例子，宴請地方官宪，并打制精美的洋点心餽贈有关的官府和中国同业。他們請客时一定要把帝俄領事也請来，以壮他們的声势。他們心里瞧不起中国官宪，但是摸清了中国官場讲面子的风气，遇到机会总是不惜金錢进行拉攏的。比如当年假道俄国往来北京的官員們，都接受过俄商在斜米、塔城等地的“盛情”招待。这些俄商在这方面送人情，作为此后取得受招待者的回报。当然，除此之外，遇到非通过中国官厅才能滿足自己的願望时，他們也是暗中行贿的。那时候的吐魯番县知事张华龄、迪化县知事陈继善都受过俄商的多次賄賂，因而在俄商同地方商民发生債務和其他糾葛时，上述的两个县知事总是偏袒俄商的。

在这方面，当时的省长楊增新却是清白的。实事求是地說，

^① 伊斯兰教徒把星期五叫作“祝馬日”，是大祈禱日，所以把每周的休息日放在这一天。

楊增新本人直到他被刺身死，從來沒有接納過俄商的賄賂。他從1912年主政起，屢屢為有關俄商、英商的交涉傷腦筋，他深深了解吃這些人的錢無異把劍柄給人，會因此身敗名裂。他常常告誡他的部屬不得與俄商作私人往還，互相餽贈，以免惹事生非。那時候各地的俄國商約依恃外力，威脅官府；官府為了保持自己的祿位，也多曲予遷就，甚至在商約到縣衙辦事時，有的縣衙竟大開中門，鳴炮相迎。楊增新為這件事曾三令五申，要各縣知事注意國家體面和自己身分，取消這種媚外的接待儀式，並定下接待商約的辦法。當然單憑這些是不足以戢俄商的气焰的，只是1917年俄國革命後，白俄勢力在俄羅斯國內被徹底消滅，俄商才漸漸老實了。但是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還擁有大量資金^①，在社會上還有一定的地位。

1917年俄國革命後，許多俄商把資金和家眷都遷入了新疆，天興行的資本家依斯哈克便是其中的一個。俄國革命和國內戰爭，削弱後來竟至斷絕了新疆俄國間的貿易，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在俄國國內被鏟除掉，在流亡到新疆的俄商看來，這無異是給他們敲喪鐘。他們日夜注意俄國國內革命局勢的發展，在反革命的白俄政府在伊爾庫次克成立後，俄商還派人去與它取得聯繫。在我未離開天興行前，經常看到這些褪了色的資本家經常聚集在一起，互相探訊有關俄國的消息，並往往從主觀願望出發，編造一些自慰的消息，比如說英日聯合進攻俄國革命政府了，某某白俄將軍在俄國的某某地方得手了，美國軍隊攻入彼得堡了，英國干涉軍占領塔什干了。而最值得介紹的是，當時有個俄國老律師皮斯特洛涅，他逃來烏魯木齊後，自稱“靈媒”，能招神靈附入人體，解答世人提出的禍

① 天興行的資本，1914年前後為二百萬金盧布，合黃金三萬八千兩。

福休咎等問題。這同解放前漢族中的扶乩、跳大神等有些相似。洋行街的俄商們往往把這個老头請來，大家坐在黑屋子里作招神的把戲。皮斯特洛渥既迷信而又狡猾，他借此來騙取俄商們的尊敬和款待。有幾次我也參加了，看出了這個俄羅斯老头的門道，我就裝作神靈附體，起初用腳來踏地板，表示神已降臨，隨後便改變嗓音回答在場的“俗子凡夫”們的問訊。每當他們問到“布爾什維克能不能消滅？”我總是回答：“不能消滅！”或“消滅不了！”問到“沙皇什麼時候復辟？”我總是回答：“公羊生羔的時候！”或“什麼時候也不會復辟！”為了取信于在座的大腹賈並迷惑皮斯特洛渥，我在到皮斯特洛渥家去的時候，找機會把他家里的小東西悄悄地揣進怀里，在招神的時候再悄悄地從一個角落上把它丟到大家圍坐的桌子上，使得這些以神來自慰的人們益感驚奇，他們說：“全能的神啊，把信物都帶來了！”因而對我裝神時回答他們的話，更感到徬徨不安。

依斯哈克為人傲慢，對本店的職工更暴躁，隨意辱罵。有一次在招神的時候，我假借神靈附體，打了他一記耳光。當時把他和皮斯特洛渥等人都吓壞了。皮斯特洛渥戰戰兢兢地說：“神可別生氣啊！是我們不好啊！”我算痛快地發泄了對這群洋商們的憤恨。我的行動後來被同事塔依爾阿洪猜到了。我對他說：“你不要揭穿，這是我們對巴依們的‘盛情’的酬答！”^①

他們往往還請阿洪誦經，祈禱真主降罰給布爾什維克，保佑沙皇復辟。

我們當時並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真理，但是由於

① “巴依”，維吾爾語，意為“財主”。

自己所处的地位并接触过一些进步讀物，却了解到巴依和我們不是一类人，而是利害絕對不同的对立的人，那么，这群俄商們所憎的，一定是我們應該欢迎的。于是，他們祈祝的我們便詛咒，他們詛咒的我們便祈祝，不能讓他們再得到他們所失掉的东西，這是我們的喜悅。在当时这种情感可以說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自发的階級情感。

現在回想起来，資產階級为了恢复他們失去的地位，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在中国参加欧战后，1918年日本派一批所謂調查員到新疆来。1919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个子来到我們的商行里，皮鞋踏在地板上吱吱作响。有人告訴我，这是日本人。不久后这个日本人被依斯哈克和其他俄商請到家里去喝茶，我趁作翻譯的机会，听到这些俄商对那个日本人說，他們想加入日本籍，从而取得日本保护。日本人回答他們說，如果有四十戶俄商申請加入日本籍，日本帝国政府可以借此向中国政府交涉，在烏魯木齐設立領事館，“保护”他們的“權益”。但是后来，俄商想加入日本籍的湊不够四十戶，再加上其他原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想望沒有实现。

俄商在俄国革命后，有一部分歇了业，大部分則轉營內貿，新疆地方同苏联恢复通商关系后，資金雄厚的俄商又兼营起內外貿易。当然，他們在帝俄时期所享受的“特惠”都沒有了。他們看到形势一时不能如他們的主觀願望轉变，便申請加入了中国籍。一直到1922年我离开天兴行，像吉祥湧等几家商行，在新疆的商业经济上还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到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有些人还登上了政治舞台。至于他們的生活享受在社会上是首屈一指的，他們起居飲食的豪奢，就是当时新疆的讲究物质享受的大官僚們，也是难望其項背的。

最后还应该提到一件事。这些俄商們都自命为虔誠的伊斯兰教徒，但是他們却经常借宗教来行小惠，欺騙教徒。比如在教規上有扎卡提稅，即教徒每年要以自己动产的四十分之一“接济”穷人。天兴行的执事人在“接济”之前，总是吩咐我們这些学徒把滞銷貨和积压多年业已变质或不堪着用的东西从棧房里拣出来作为“接济品”。再有，有的債務人真的还不起欠他們的財物时，他們也来一套“宗教仪式”，把負債人應該还他們的財貨折成貨幣，然后拿出一包东西作为这笔款的代表，当着負債人的面把这个包在念罢祈禱詞后遞給負債人，算是他們的“慷慨”贈賜，随着又把这包东西从負債人手里取回，算作負債人还清了他們的債務。他們說，他們这样作是奉行真主的意旨。在当时，穷人的觉悟尚未提高，有的真的被他們的这套手法蒙蔽住了。

前后十二年的洋行生活，使我明白了不少人生社会的道理，为了进一步滿足自己对这些道理的追求，在这十二年里我还从俄国买来一套多年制中学的全套課本和新书刊进行自修，同时还学习汉文汉语。天兴行可以說是“我的大学”。在写这段东西时，我曾翻閱几十年前仅存的筆記本，发现在一个筆記本上有当时我用汉字写的一句話，“小子讀書不用心”。当年硬挤時間自修和老板对我以及对同事和穷苦人民的剝削、欺騙等情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了。可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領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往日的情景是一去不复返了。

三 在革命动蕩中的两件事

1912年9月我踏上祖国的土地，距武昌起义已经将近一年了，可是我在塔城街头並沒有看到什么新的气象，副都統出門还是

坐轎子，鳴鑼開道，衙門口還擺着棍棒和囚人的木籠。市集和一些廣場上公開擺設賭攤，賭博拈擲子在那里驅人，有時竟大打出手^①。

當時，我對這些現象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感覺。在斜米我從報刊和人們有關時事的談話中，知道祖國起了革命，清朝的皇帝已被推翻，建立了中華民國。當年在俄國，談論革命並不新奇。對一些人說來，革命是毀滅的代用語；但對廣大的人民說來，革命則是希望。可是起了革命的祖國，怎麼看不出什麼含有希望的東西呢？據天興行塔城分店的人講，新疆現在還分成兩派，新派本年初在伊犁鬧革命，殺了伊犁將軍，成立了革命政府。舊派以烏魯木齊為中心，出兵“討伐”。他們雙方在伊犁到烏魯木齊的大路上固爾圖等地方打起來，而且打得很厲害。後來北京皇帝退了位，成立了中華民國，新疆巡撫“袁大人”不得不派代表同伊犁談判和平，6月間雙方終於在塔城簽訂了和議條件。現在“袁大人”已經回了北京，新疆由“楊大人”統治了，聽說官銜改成了都督。只是烏魯木齊同伊犁還沒有和好，同時，南疆一帶也很混亂。

根據分店里的同事們的談話，新疆是在革命和動蕩里，不過我從塔城去烏魯木齊的路上，卻沒有發現什麼不安的現象，只是烏蘇城內外駐扎着很多省里的軍隊，據說是準備往精河開的。

到了烏魯木齊安頓下來之後，我的對祖國的關懷和好奇心驅使我接觸現實，從而聽到、看到許多事物。現在回憶起來，其中有不少已經為後來的報刊或專著所記述，在此地沒有重述的必要，我只把下面的兩件事寫一下。

① 新疆土語把靠賭錢騙人的人叫作“賭博拈擲子”。

其一是，1912年1月的伊犁起义是得到当地少数民族支持的。

当年，伊犁是少数民族荟萃的地方，城市里维吾尔人、回族人占的比重较大；被编成旗营的有锡伯人、达斡尔人（索伦人）、察哈尔和厄鲁特蒙古人；还有过游牧生活的哈萨克人、蒙古人^①。他们都直接受伊犁将军的统辖，除了王公、台吉等上层分子，他们几代来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对统治阶级自然不会有好感。至于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没有保障同挟有“特惠”的俄商竞争，对现存政权也是不满的。尤其是帝俄领馆在伊犁遇事专横，俄侨倚势欺压地方居民，而将军、副都统则但求敷衍，不能为人民与外力抗争，就更加剧了居民同统治者的矛盾。伊犁在当年是个对外的通商口岸，从东方和西方流入的民主思想在上述的居民心理上是很容易发生作用的。

以杨缵绪为首的革命党人估计到少数民族将在革命运动中起一定的作用，因而把争取少数民族作为他们的革命策略之一。他们曾着重向维吾尔人、回族人宣传，指出在新疆的高级官吏中虽然有不少汉族，但是他们是清政府的代表，他们在镇压、迫害人民方面，对待汉族同对待其他民族是不分畛域的。革命党人所编的白话报也用少数民族的文字印行。

革命党人还以哥老会作为组织群众的手段，当年在伊犁开山立堂的徐三泰曾吸收了不少少数民族参加。哥老会本来是个以游民为主体的、着重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组织，它的组织思想相当开

① 在伊犁境内的哈萨克人属于黑宰和阿尔班两部落，当年游牧于博罗塔拉；蒙古人有西路旧土尔扈特，牧地在精河南岸，厄鲁特蒙古是准噶尔才遗，察哈尔蒙古是清乾隆年间自宣化边外迁来伊犁驻防的。